



宕昌县理川

区域史 研究

TANCHANG XIAN LICHUAN
QUYUSHI YANJIU

李稳 杨海帆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我们写这本书的起因是：宕昌县理川地区是历史上古羌人、吐蕃族、吐谷浑、满族、蒙古民族、汉族密集居住区，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为了不使多元文化元素在历史的长河中濒临流失，宕昌县档案局为了及时抢救极具各民族文化特点的珍贵历史档案，决定立项进行紧急抢救和保护。

2013年年底，时任档案局局长的李稳同志，经过询问当地县情知情人士并反复研究多点论证，最后将2014年的“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项目”选题定为《宕昌县理川区域史研究》。该保护项目初步选定之后，上报陇南市档案局，市档案局初选后，又上报甘肃省档案局，省档案局上报国家档案局，最终由国家档案局审定批准，由宕昌县档案局具体实施这项抢救、整理和编研工作。

2014年4月成立了《宕昌县理川区域史研究》编研小组，由李稳局长主持召开了三次实施论证会，同时，她带领编研小组深入到相关地域进行艰苦细致的田野考察，前后历时两个多月，走访四个乡镇二十多个自然村，踏遍理川区域内的山川、河流、古城堡、古道路，采访了近100人的当地年事已高的老人，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阅读了当代专门研究岷州民族史、区域史的专家、教授

们的研究论文,从中得到了我们想要却无法直接自获的珍贵资料,弥补了《宕昌县理川区域史研究》链条上的缺憾。比如:被我们参考转述的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建丽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双智讲师、澳门大学历史系汤开建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化典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惠玲、西北师范大学漆子扬教授的相关论文观点,秦江月先生的研究资料,以及从互联网获得的但尚未署名且无法直接取得联系的学人们的部分研究资料,对此,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这项编研项目起步调查的时候,由于时间要求比较紧迫,年内项目年内完成,因此,工作组的同志们始终坚持当日的调查笔记、录音、照片、绘图资料当日梳理、归类、编码,一边调查一边编写,调查和编写同步进行,主笔人往往要工作到深夜两点左右,其中的辛苦可谓难以言表!

说到理川这个自然地理名词,外界的朋友们知之甚少,读懂的更加少之又少。但是,就因为祖国大地上尚存理川不被人们认知的空间,却恰恰给历史文化留下了人无我有的极具特色的沉积,十分厚重的值得学人们进一步研究历史文化宝库,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开始和探究,如果要进行纵横点上的深层次的研究,我们将寄希望于后来者!

理川,这个地理名词在上古的时候,并不是“理川”而是“荔川”,荔川地名的使用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民国晚期,历时几千年,直到民国年间岷县县长蒲宝阳将其更改为“理川”,才使古老的“荔川”地名被替换。蒲先生的理由是:荔下加三力尚武好斗,取“理”者,以理服人也。蒲先生的理解其实和“荔川”的本义相去甚远。

在田野考察中,我们经常听到理川当地的老人们说:“先有荔家人,后有荔川城。”这个“荔川城”指的就是东汉修建的“锁西城”,史书上记载的是“索西城”,也就是说,在东汉修建锁西城之前,荔姓人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大地上并且是一个非常庞大、强大的族团群体。这个民族群体就是上古时代生活在理川区域内的荔姓古羌人,他们是创造理川史前文明的先行者。

古代荔川之荔姓羌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生活在荔川广大地域里,他们是一支史学家并没有进行系统研究的一支羌人族群。我们在理川转转山上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尽管它是一个个案,但它毕竟透露

出远古时代人类生活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信息是由荔姓羌人释放出来的。“荔川”一词作为地名、部落名经过了几千年漫长的岁月,经历了从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所知直至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从语言到文字,从约定俗成到标准化,在特定的范围、特定的时间,成为荔川地理实体的专用名词。

荔川之“荔”是古代羌人的部落名和姓氏的最基本的元素。

“荔川”之“荔”,指古代羌人图腾崇拜和姓氏,“川”指古代荔氏羌人居住的自然环境,合称“荔川”,这便是“荔川”地名字面所表达的含义,它是人们为地域命名时的着眼点、因由和理据。

所以,后人把“荔川”更改为“理川”是不妥当的!

那么,荔川之“荔”是怎么来的?它的历史根源在哪里?经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荔川之“荔”源于一种兰草,俗称马莲,或马兰,马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别名叫“马荔”,现在理川片区的木耳乡有一个古代遗留下来的部落山寨叫“马莲川”,别名叫“马荔川”,简称“荔川”。这是理川古老地名“荔川”来源的根本因由。现在的马莲川村坐落在马莲草山坡地山脚之处,地势比较平缓开阔,村庄与马莲草山中间是谷间川坝地带,故而叫马莲川,可能最早的地名也叫“马荔川”。和马莲川村同处在一个缓坡地带的是豆寨村,豆寨地势非常平坦,在豆寨和马莲川两个自然村里分别有两个规模比较大的寨子,一个叫豆寨堡子,一个叫马莲川堡子,和这两个堡子相对应的是马莲川草山堡子,三个堡子形成了三角形环线,中间有一条古老的马车道。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七记载:“初,王韶既城河州,独将兵至马练(莲)川,降瞎吴叱,进攻宕州,拔之;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北宋时期的瞎吴叱和本令征同时镇守的是岷州,从《长编》记载的这一段话来看,北宋时期的瞎吴叱和本令征并没有同住岷州城内,瞎吴叱带兵镇守的是岷州前沿阵地马莲川,本令征驻守的是岷州城,一个是前沿大帅,一个是守城大将。因此,王韶要进攻宕州,必须首先攻破马莲川所在地的三大堡寨,马莲川军事防御阵地一失守,岷州城很难自保,迫使本令征不得不投降。王韶收复岷州所有失地之后,然后进攻宕州。当年王韶领兵行走的就是马莲川古道,翻山进入宕州之地。之后,宋在马莲川、别名马荔川设立了“荔川寨”。

这个荔川寨,也就是现在的马莲川一带,我们进行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现了古人类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这足以证明古代的荔姓羌人就生活在马莲川广大地域,并从事狩猎和农耕,同时有相当一部分荔姓部落的古羌人迁移到现在的理川镇所在地之理川盆地地带定居。而且马莲山草山和谷地地带到处都是马莲草,据当地豆寨村村主任告诉我们:马莲川川谷地带,过去整个是一片马莲草,茂盛得超过一人多高,马莲花一开,蓝莹莹一川。花是一种名贵中药材,叶子还可以编织日用家具,根可以制作刷子,全身是宝。古人对马莲的认识和挚爱,要远远胜过当代的人,在生产极其落后的上古时代,这个马莲草可以说是古羌人的生命线,从生活用品到药用治病,都离不开马莲,所以,这里的古羌人把马莲作为图腾来崇拜,并且引申到部落名和姓氏名,乃至后来的地名,可见那种挚爱的情感是非常的深厚的。

当代人提出的“先有荔家人,后有荔川城”结论是源于上述历史事实产生的,这便是荔川地名的根由之所在。据现代姓氏专家汪宗虎和陈明远编写的《中国姓氏辞典》(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记载:荔“亦作荔菲、丽飞或利非。原为历史上羌族姓。唐代有荔非守瑜,隋有荔非雄。现代仍有此姓。”现在还存在的荔姓群体,久居陕西、甘肃的庆阳市宁县焦村乡高尉村、新宁镇,正宁县永正乡等地,宕昌县的簸箕等地,内蒙古、山西、湖北亦有。

理川(荔川)片区,我们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在岷江上游和理川(荔川)河沿岸,发现了大量的古人类生产生活的古遗址,这里的古遗址主要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集中指向古羌文化。因此,这里在上古时期,基本民族群体就是古羌人。

东汉时期荔川修建的军事防御城叫索西城(当地人叫锁西城),《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建初二年,烧当羌寇陇西,马防讨平之。乃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对此,岷县地方史志学者景生魁老先生经多年研究表明:“索西城究竟在哪里?有人说,即今岷县梅川古城。其实,按当时行军路线地望分析,梅川古城即龙叠城,前汉曾置南部都尉。马防解临洮围,筑索西城,徙南部都尉居之。索西城在今天的宕昌理川镇,而马防又将前汉南部都尉迁到了理川。理川为后汉的索西城,有据可考者有三:1. 自古以来,理川旧城门就有“锁西”标志,索与锁同音有误;2. 清代宣统元年理川蔡家里出土文物佐证。出土的文物有铁铍、铁斧、

人头骨等。有人猜测是大禹治水的遗物。经多年考证,是马防筑城的遗存。这些文物在民国十一年由岷县县长郑震谷装木箱保存,后因时局变化遗失了(参阅车世明著《故土情怀》一书)。3.《汉书·地理志》载:‘武都郡有索县’,有人考证说:索县即佑川县的前身,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考证。”

理川城规模是很壮观的,理川镇 80 岁的老先生胡俊、陈玉德对古城的描述是:“方圆二里半,城心一里三”。城墙底部宽 20 米,顶部 10 米余,由此可见这座古城的雄伟和壮观,它是古代的军事重镇!说古城是军事要地,最有力的佐证是巡山梁和古代的关隘,所有的关隘都围绕着理川城分布。理川城西北有座山,该山梁极高,古代有驻兵在山梁上巡查军情,古称巡山梁。站在巡山梁上,下可以看见大舍口(古隘口)、哈竜口上行之敌;上可看见八力方向布竜、拉子口、石门口来的敌人;东可以看见拉寺口一带的敌情;西北可以看见拉路口之敌。巡山梁位于理川城西北,每隔二里多路的山头上都有烽火台,各地信号皆由巡山梁转送理川城。再远一点的军事要地就是南河乡的前关坪和寺卜寨的隘口,大者为关,小者为隘;这里是理川古城最重要的前沿阵地,前关大坪上的古城堡和保存很完整的兵塘烽火台是把守理川的一个铁门槛,前边是关口,后边是寺卜寨隘口,有两道封锁线。除此而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军事要道,那就是从理川城出发,途经扎固石门到申都,出二阳沟到茶阜,再到岷县梅川古城,也就是汉代的龙叠城。梁大同七年(541)正月,宕昌国王梁仙定再次举兵反魏,曾驻兵于赤水县(汉代的赤水,就是现在岷县的梅川),当年梁仙定所走也就是这条古道;唐代吐蕃入侵理川走的也是这条古道,有石门口悬崖上书写的藏文可以佐证,因为吐蕃是藏族的前身。

从以上可以看出,理川城四周都有驻军把守的关隘,可见它的重要性,它是宕昌县又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汇的中心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周,理川是岷州州置所在地,同时设立了郡、县。岷州州治先在岷县益乐也就是现在的岷县城关,后又移置佑川,也就是现在的理川。岷州是什么意思?岷,是山名,现理川镇镇政府所在地的东北有一座大山脉就叫岷山;州,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名。岷州行政区划的范围以现在的贾河乡雪岭峪儿里村以北为界,大致包括南河乡、贾河乡的簸箕、峪儿岭、将台乡的部分村社,大舍、理川镇、牛家乡、庞家乡、木耳乡、金木乡、八力乡、哈达铺镇、岷县全部,以及漳县等地区。至少在宋代

岷州不包括宕昌镇以下东南、东北各乡镇,因为那里是宕昌国所在之地。宕昌国被北周大将田弘灭亡之后,建立了宕州,在隋、唐、宋各个朝代,宕州依然存在,岷州和宕州同时存在。宕州在南宋之后为里,归岷州,有些人把这两个州混为一个州,也就是岷州,这是错误的。《隋书·地理志》中说:“后周置佑川郡、基城县。”至少在后周,理川就建立了郡县,郡下管县。郡县制的出现最早是在秦汉时期。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155 就有岷州的记载,在“岷州”下说,佑川在岷州,本后周基城县。也就是说,理川在北周时先有基城县,后又改为佑川县。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佑川郡和基城县同时取消,唐代武德元年(618)又恢复了基城县,隶属岷州。宋金时期,王存等人写的北宋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记载:“唐岷州,后废。皇朝熙宁六年收复,仍旧置。”唐代广德年间,岷州之地陷于吐蕃,吐蕃人占领了岷州州城(理川城)之后,就由吐蕃大首领唃廝囉部的瞎吴叱和岷州人本令征两个人驻守岷州,后来,在宋熙宁六年被宋将王韶收复。《宋史·地理志》一书中说:崇宁三年(1104)复置佑川县。清代学者顾祖禹在他编写的《读史方輿纪要》卷 60 中说得更加明确:“岷州,佑川城。”佑川是哪里?不就是理川吗!宋代绍兴四年(1134),由于宋将关师古的叛变,岷州被金朝占领,金人在岷州州治所在地佑川建立了佑州。元明时期,明代洪武十三年(1398)袁福征写的《修建岷州记》中说:“至元(元朝一个年号),复于佑川境置岷州。”清代康熙四十一年写的《岷州志》一书中也提到“元于佑川县境复置岷州”。清代晚期岷州秀才陈如平写的《岷州续志采访录》一书中说:“元代岷州在理川。”民国著名方志学家张维经过大量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元代岷州,为旧佑川县地。《明史·地理》一书第 1011 页记载:明洪武四年复于佑川旧地建立岷州千户所,洪武十一年千户所升为岷州卫,属陕西都司,洪武十五年四月升为军民指挥使司。在此期间,岷州卫又是岷王府所在地,驻守岷州卫的藩王是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儿子朱楩,藩王名号岷庄王。后来为了加强云南边境的军事防守,又于洪武二十四年率军到了云南,在云南驻守时,朱楩的尊号依然称岷庄王。清代以来,理川再没有过州、县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设置。

理川在历史上设立过郡、县、岷州、岷州卫等军政机构,而且又是古羌人生存的大本营,所以,这里集古羌文化、汉文化、吐蕃文化、吐谷浑文化、满蒙文化之大成。古羌文化为这一地区开创了史前文明,汉代以来大汉民族的文化是这

一地区的主流文化,多角度全方位渗透到各个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西北的吐谷浑文化也融入到这个地区。唐广德以来和北宋时期,前吐蕃和后吐蕃统治岷州长达 300 余年,吐蕃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沉淀是非常浓厚的。多个民族群体大量云集在这里,与当地汉羌民族融合,共同接受汉族文化的洗礼,逐步实现汉化,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而且,当时的统治者也很重视这一点,往往颁布命令实行,或采取怀柔的民族政策,身先士卒接受汉族文化,因此,多民族文化在这里有过碰撞、交融、沉淀,最后全部融合到汉民族之中。理川的历史,实际就是民族融合的历史。

唐广德元年以后,吐蕃占领岷州,由于吐蕃落后的奴隶制社会经济文化对岷州文化的冲击,使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处于滞后状态。“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奴仆”。随着吐蕃军事实力的扩张,“自轮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得野泽之中”。奴隶制在岷州的普遍推行,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蒙元时期,统治阶层借用吐蕃军民一体化的渗透式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一时期岷州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具体而言,宋夏时,岷州经济仍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元时则迟滞尤为显著。

宋初,农业经济不甚发展,主要生活来源靠畜牧和野生植物采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的羌马,作为北宋战争所用或市场之牲畜,动以成千上万,亦可看出其畜牧业的发达。茶马贸易占有很重要地位,畜牧业成了岷州地区的支柱产业。

元代岷州的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续资治通鉴》记:“蒙古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时诸将多掠子女。”人民除被杀掠,多逃亡流徙;甘肃中西部一带,田地荒芜,道仅相望,某些州县,为之城空。甘肃东南部也被严重屠掠。元末,甘肃饥荒更为严重,岷州亦同,人民颠沛流离。至明初,土地大部荒芜,社会经济生活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明清两代是岷州社会生产力的又一个发展时期。

屯垦为明代的重要农业政策。元时岷州农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屯垦政策

的推行,对于当时岷州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洪武二年,明中央政府命令:“临洮、岷州、宁夏、洮州、西宁、甘州、庄浪、河州、甘肃、山丹、永昌、凉州等卫屯田,岁谷种外,余粮以十分之二上仓,给守城军士。”这一政策的实行,意味着屯田在甘肃广泛实行,从而加速了岷州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由于明代为西北的军事形势所迫,农业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西北边防能否巩固,所以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屯田极力谋求整顿和发展。成化十二年末,明廷命余子俊巡抚陕西,后又奏免岷、河、洮三卫戍南方者万余人。嘉靖八年(1529),甘肃各卫所“委官统领所管步兵,给以牛种农器,垦辟屯田。水地三年之后起科,山地永不征赋,其将领垦田百顷以上者奖励擢用”。

明末清初,战争使岷州经济又一次遭到重大破坏。土地大量荒芜,人民也大量逃亡。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从顺治至乾隆各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在废除明末“三饷”的同时,废除了“荒粮”,及时减免“灾粮”。尤其是乾隆中前期,甘肃连年蠲免,加以“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行,明显地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

清中前期,由于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及对农业经济的重视,轻赋役,力屯垦,大兴水利,甘肃农业经济发展达到封建社会后期的高峰,岷州也不例外。雍正二年,甘肃全省有耕地 21.7601 万顷 28 亩,乾隆十八年增至 28.5347 万顷 36 亩,乾隆三十一年已达 35.0928 万顷 55 亩。人口亦有大幅度增长,乾隆十四年,甘肃人口即达 570.9562 万人,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甘肃人口已达 1200 余万,达到封建时代的高峰。

自唐至宋初,岷州陷于吐蕃。藏传佛教也开始向岷州地区传播和发展,寺院和僧侣成了权力和神圣的象征。在 2014 年 5 月召开的理川籍退休老干部座谈会上,李兴栋、王克俭、张焕文等提到,在宋以来,理川境内修建有包家寺、马家寺、台子寺、曼古路寺、川林寺、汪巴寺、菩萨楼、扎固寺、吉祥寺(庞家),大舍沟玛尼寺、白音观音寺、蔡家寺,上述寺院并不包括理川以外各地寺院,只指理川境内的寺院,实际数字,远远不止这些。据扎固村退休干部本世清说:“理川地区的扎固寺就有 18 座,和尚 300 多人。河对面一面坡整个是和尚的拴马坡。”上述寺院,已经名存实亡,成为史迹,但它反映了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的基本状况。

由于这些寺院的存在,客观上加强了汉藏民族的了解和文化交流。这些寺院存在与发展,为研究民族关系史、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等方面都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岷州僧人在宋明两代,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利益、民族团结以及弘扬藏传佛教、沟通藏汉文化交流,尤其是在发展藏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是在明史上,还是在藏传佛教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是很值得人们研究的。岷州藏传佛教对杂居的汉族群众有较深影响,在汉族人口众多的地区有比较多的藏传佛教寺院,成了藏传佛教重要的传播地区,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地吐蕃族、羌族全部融入汉族群体中,使这些寺院客观上成了汉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

部分普通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这从理川汉族群众的信仰及其即供奉的家神中看得出来。当地的汉族家家户户都有家神,烧香、煨桑、磕头。家神,大致可概括为两大类:一是藏化了的护法神,俗称“番神”。其性格暴烈,形态可怖,更能增加信徒的敬畏之心,从而听命于说教。比如扎给赤秀,俗称扎给爷、三途爷、扎给白秀。细究信仰“番神”的汉族的人群,历史上都是吐蕃人或羌人。

二是还有许多的龙王爷、老爷和奶子娘娘、透山娘娘、珍珠娘娘、铁丝娘娘、菩萨神之类。这种神大都来自《封神演义》和历代忠良名将及传说中的天神之类。诸如姜维、庞统、关公、菩萨、九天仙女等。

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庙宇。如大王庙、黑池爷庙、岷山庙、魁星阁、关帝庙、药王庙、牛王殿、马王庙、泰山庙、封神庙、二郎庙、鲁班爷庙、赤途庙、鬼章庙等。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理川泰山庙。

理川历史上的宗教文化,不仅仅是宗教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文化的推行和传播,促进了理川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上的沟通。各类庙会又是各民族之间进行集市贸易活动的最佳场所,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男女在一定范围内接触、了解、沟通,喜结良缘,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互信互敬互爱。

由于理川曾经设立过岷州及岷州卫建制,各地的人都集中在这里生活,因此,理川的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南方的曲艺、旱船艺术、中原的马戏、羌人的傩舞、吐蕃人的射骑术、蒙古高原的骑马术、寺院僧俗,以及当地的民间小曲、武

术等等,如群星灿烂,丰富多彩。

这部《宕昌县理川区域史研究》的成稿,仅仅是依据理川历史发展的脉络按照历史时空进行编写的,只是做了粗线条梳理和一般性的交代,但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了宕昌县区域史的空白,同时,我们进行了一些尝试,在探索中力求史料的真、精、新。

向来有一种说法,理川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历史比较短暂,没有什么写头。其实好多人并不了解理川区域史的厚重,光一个理川之荔氏羌人族群的历史,如果深入研究下去,就可以写成一部厚重的专门史。如果将理川历史上的多民族生产生活及其发展、融合深入研究下去,同样可以写出一部厚重的民族关系史。

近些年来,人们对理川的某些时段的历史脉络论述不够准确,史料又严重缺失,如宋代“荔川寨”的地理位置,岷州吐蕃首领和宕州吐蕃首领,岷州卫在理川设立的具体时间,古代城镇及军事要塞的建设,古道路在军事上的应用,城、镇、寨堡的配套建设,岷州及岷州卫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军事设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以及重大事件。这些在这次考察中均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凡研究岷州历史的文献成果,我们在引用的时候尽量采用最新研究成果,并利用新发现的考古史料,确保史料的精准性和周密性。

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对比较重要的寨堡和军事要道、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古代部落生存地,不管路途多遥远、多危险,一律进行徒步勘察、丈量 and 绘图,同时采取拍照和摄像记录原貌,以备后查。对每一个历史事件,均做了采访记录。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历史事件,田野调查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尽量确保其正确性和严肃性,不做任何个人主观的猜测和不切合实际的推断。

理川涉及的重要古地名只有一个,那就是“荔川”和“理川”,在描述古代历史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出现荔川古地名时,我们便在括号里注明现代使用的地名“理川”,在后边的行文中我们不再注明现代地名。

本书主要是叙述理川区域史,因此,凡是全国性的政令、社会制度以及军事行动等,如对岷州有直接的或较为明显影响的则叙述,否则从略。

本书基本上采用朝代纪年加注公元的办法进行记述。

本书从编写到出版发行,灌注了很多人的心血和艰辛的努力,在此,我们谨

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对有些问题的钻研还很不深入,因而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我们真诚地希望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的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不断改进和提高。

编者

2014年6月



理川镇镇政府局部图 (李稳 摄)



理川境内岷山山脉局部 (刘凤彩 摄)



理川区域马莲川城堡、豆寨城堡 (李稳 摄)



理川镇尚营城堡 (李稳 摄)



理川区域石门城堡古代马车道 (胡小英 摄)



理川区域石门古代关隘遗址 (李稳 摄)



理川区域前关坪烽火台（胡小英 摄）

汉代理川
通往岷县、天
水、陕西长安
古道路局部
(刘凤彩 摄)



汉代理川通往岷县梅
川的古道路局部（刘凤彩
摄）



理川镇麻界滩村阳坡山
齐家文化古遗址 (李稳 摄)



理川区域卧龙村鸡
头寺老庄元代石刻祭祀
图 (胡小英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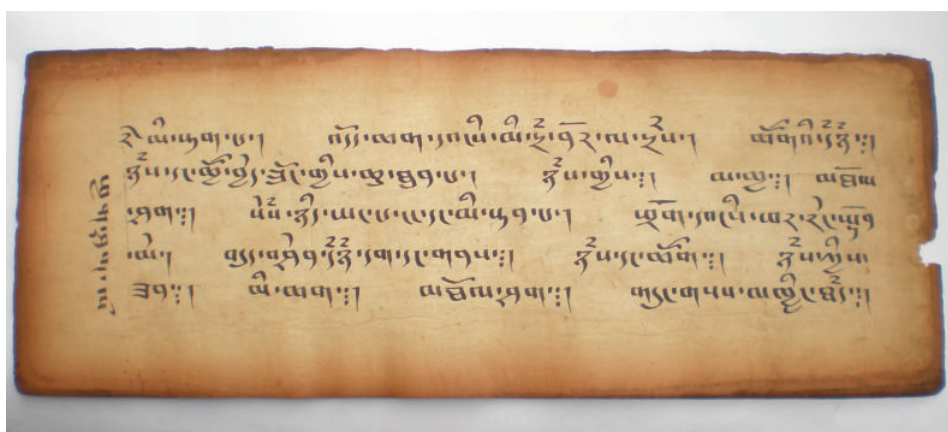


理川镇古居与古街
局部 (李稳 摄)

理川区域寺卜寨村出土
的新石器时期的石磨盘残部
(杨海帆 摄)



理川区域尚营村新石器墓葬出土的鹿角化石 (胡小英 摄)



理川区域古代苯教经文册页 (杨海帆 摄)